

馬公的寺廟與市鎮發展

余 光 弘

一、前 言

澎湖設治開發遠較台灣本島爲早，今年（1981年）該縣曾盛大慶祝其設治七百週年紀念，這是由元代在澎湖設巡檢司開始計算起之故。雖然如此，究竟因面積過小，兼且地瘠民貧，在歷代的各種文獻資料中，均少記錄其事。較完備的史書始於乾隆中葉，澎湖廳通判胡建偉的「澎湖紀略」〔1771〕，其後繼者有道光中蔣鏞的「澎湖續篇」〔1832〕，以及光緒中林豪的「澎湖廳志」〔1893〕。惟三書撰成之時間，各相距約一甲子，在時間序列上資料並不能銜接連貫；再加上修志者每多言簡意賅，使後人很難從一斑以窺全豹。故研究澎湖的歷史，遭逢的最嚴重問題厥爲信而可徵之史料的缺乏。

筆者世居澎湖馬公，每見有關澎湖的公私著作文獻中，僅止於反復傳抄舊志，輾轉於故紙堆中，人云亦云，無法突破前人的窠臼；乃圖另闢蹊徑，嘗試從與寺廟有關的資料之搜集研究中，推究出澎湖縣治所在的馬公，其市鎮自清領之後至今發展

的概況。冀能由舊史料中推陳出新，以期有助於對馬公的開發擴展過程之瞭解。但因手邊資料仍嫌不足，及筆者個人的疏漏，掛一漏萬之失難免。尤其筆者個人無法閱讀日文，許多極有價值的日本文獻不能查考應用，故本文的缺失必定極多，還望諸前輩先進多賜指教。

以下所述之資料，除翻閱舊志所得外，都是筆者在馬公實地調查訪問的田野材料。除第一節的前言及第六節的結語外，正文共分四節；第二節分別列出馬公市區中現有的寺廟，和曾經存在，現已拆毀之寺廟的簡略資料，以做為本文討論之主體。第三節將各廟始建、修建、整建或捐助廟產等情事，逐廟做一系統的概述，根據本節的材料，才發展出以下二節的若干推論。

第四、五節係把馬公市鎮與寺廟彼此之關聯分成兩個階段來加以討論。第四節主要是著重在清代，由於此一時期馬公的開發擴展狀況不明，故筆者希望能由寺廟的相關資料，推知當時馬公市鎮機能的轉變，及限制或促進市鎮發展的若干因素。第五節討論清政府的勢力撤出後，自日據以後迄今，寺廟在政治、經濟等外在世俗因素轉變之後，其本身在功能上的調整轉換，以及寺廟發展與市鎮擴展步調的配合、寺廟的興衰存廢與市鎮機能變遷的相關性。

在正文未開始敘述之前，筆者先將馬公的背景資料撮要做一簡介。

馬公原名「娘宮」、「娘媽宮」、「媽娘宮」，至清時簡稱「媽宮」，因明代早在此建立一座天后媽祖宮，由廟名而轉成地名〔陳知青1973:66〕，至日據時期民國九年始改稱「馬公」，一直沿用至今。

馬公之能成為澎湖首邑，是由於其良港天成。方輿紀要謂：「隘口不得方舟，內嶼可容千艘」〔轉引自張默予1972:6〕；在往昔風帆時代，泊舟港澳須擇風向，而選泊於南風澳或北風澳，馬公港則不論南、北風皆可泊船〔胡建偉1771:17〕，故成為往來台厦水道船隻的中繼站。

因此清廷擊敗明鄭及清力量後，澎湖被視為海疆重鎮，原先駐水師一協二營，由一副將領兵二千鎮守；光緒十三年改協為鎮，澎鎮改由總兵官駐節。馬公當時就

是清軍駐澎湖部隊的大本營所在，有半數左右的軍力留駐於此。

雖然清代澎湖巡檢署與後來的澎湖廳署，都設在文澳（今西文里），直到光緒十五年才遷入剛竣工的「媽宮」城內，但媽宮市區却一直是實際上的經濟及軍政中心。非僅協營各官衙署暨廳倉俱設在此，內港更是商哨灣泊之所，昔時全澎各澳社的所有衣食器用，都要到此購覓買售，因此其重要性日增，各色人等均逐漸滙聚於此，胡建偉的「澎湖歌」有云：「……惟有媽宮市上頗不馴，言龐事雜多游民，草竊無聊兼牙儉，鯨兵蜂聚重為鄰……。」〔1771：277〕可見其早具市集之型態，居民已不似一般鄉村的同質化。

此種政經中心的地位，歷經二百餘年至今未曾改變，故其人口日趨集中。乾隆卅二年（1767）時媽宮人口1,440人，約佔當時全澎十三澳（媽宮屬其中之東西澳）總人口25,843人的廿分之一強（5.57%）〔上引書：220〕。至民國七十年九月底的統計，馬公市區人口已達26,784人，佔全縣總人口105,896人的四分之一強（25.29%）。

人口的大量增加，導致市區範圍的不斷擴張。最早發展的大約是在渡口所在的復興里及中央里一帶，以後再往東，往北漸及於啓明里，長安里及重慶里。清末所築的媽宮城內三甲的範圍即是這五個里，南甲即今復興、中央二里及長安里的南端，東甲含今之啓明、重慶二里，北甲約略等於今之長安里。當時其郊區的紅毛城（今朝陽里紅木埕）及火燒坪（今光明、光榮二里）也開始形成小聚落。近年人口更急遽的膨脹，導致市區不斷向北伸展，終於和郊區的衛星聚落連成一體。故下文筆者所論及的馬公市鎮之領域，除「城內」的五個里之外，尚包括其北的中興、光復、光明、光榮、朝陽、陽明、新復等共計十二個里。

各里之大略位置請參見下頁地圖*。〔註一〕



- 1. 天后宮
- 2. 祀壇
- 3. 北極殿
- 4. 觀音亭
- 5. 水仙宮
- 6. 武聖殿
- 7. 施公祠
- 8. 三官殿
- 9. 捉標館
- 10. 銅山館
- 11. 烽火館
- 12. 海壇館
- 13. 南澳館
- 14. 媽祖館

- 寺廟代號
- 15. 武忠廟
- 16. 地藏廟
- 17. 城隍廟
- 18. 風神廟
- 19. 福德祠
- 20. 景福祠
- 21. 龍王廟
- 22. 陰陽堂
- 23. 海靈殿
- 24. 一新社

- 宮祠殿寺寺
- 25. 北辰祠
- 26. 程朱祠
- 27. 朝陽祠
- 28. 靈光殿
- 29. 潮音寺
- 30. 菩提寺
- 31. 法界寺

馬公市區寺廟分佈圖

二、馬公寺廟的分佈

馬公市區內的寺廟，根據台灣省通志所載的資料計有十九座〔李汝和 1971：452-454〕；台灣省各縣市寺廟概況表則列有廿四座〔省民政廳 1975〕；澎湖縣志文化志中同樣列有廿四座〔莊東 1978：51-57〕。筆者在今年四月之前的半年間，曾做過一次澈底的普查，發現後二者的資料已算很精確，僅有一座有應公廟（祀壇）漏列，省通志中所載的一處家庭神壇亦未列，另有六十九年剛建成之佛寺一座當然未及列入。故總計馬公市區現有寺廟為廿七處；但在本文中筆者所謂的寺廟係指「安置神像、神壇及香爐，而一般民衆得自由進出（參拜）的建築物」〔Deglopper 1974：46〕，所以在此有家庭神壇三處（坤儀堂、興善堂、東鳳宮）、及私人性質的齋堂二處（太和堂、澄源堂），不擬論列，實際上筆者在本文中所探究的現存寺廟計有廿二處。

以下即以簡表列出馬公市區內現存之廟宇名稱、供奉主神及寺廟座落位置：

表 1 馬公市區現存寺廟表

寺廟名稱	祀奉主神	座落位置
1. 天后宮	天上聖母	長安里正義街
2. 北極殿	玄天上帝	啓明里啓明街
3. 祀壇	無祀陰光	光明里
4. 武聖殿	關聖帝君	朝陽里紅木埕
5. 水仙宮	水仙尊王	復興里中山路
6. 觀音亭	觀音菩薩	中興里
7. 施公祠	施琅	中央里中央街
8. 三官殿	三官大帝	陽明里新生路
9. 提標館	天上聖母	中央里中山路

寺廟名稱	祀奉主神	座落位置
10. 銅山館	關聖帝君	長安里保安街
11. 城隍廟	城隍爺	重慶里
12. 福德祠	福德正神	啓明里善後巷
13. 陰陽堂	陰陽公	長安里
14. 一新社	關聖帝君	光復里新村路
15. 海靈殿	蘇府王爺	復興里中山路
16. 景福祠	福德正神	中央里正義街
17. 朝陽祠	洪先生公	重慶里民權路
18. 北辰宮	朱府王爺	長安里長安街
19. 靈光殿	朱府王爺	光榮里火燒坪
20. 潮音寺	釋迦牟尼	朝陽里中華路
21. 菩提寺	釋迦牟尼	朝陽里新生路
22. 法界寺	釋迦牟尼	光復里新村路

除上表所列現存的寺廟外，翻檢前清澎湖志書和各寺廟碑記，以及故老相傳的口碑，也可以找出許多曾經在馬公市區內存在過一段時間，現已拆毀的寺廟。筆者手邊所能找到記載馬公寺廟的清代方志計有澎湖志略〔周于仁 1736〕、澎湖紀略〔胡建偉 1771〕、澎湖續篇〔蔣鏞 1832〕、澎湖廳志〔林豪 1893〕，另外台灣縣志〔陳文達 1720〕、重修台灣縣志〔王必昌 1752〕亦列有澎湖地方之寺廟。惟周著之志略胡著之記略及台灣縣之二種志書所列諸廟，至今均仍存在，前面已經述及，故筆者僅從蔣、林二氏之著作中，及其他碑記和筆者訪問故老所得，整理成下表，列出馬公市區內曾經存在而現已拆毀無存之寺廟如下：

表2 日據前馬公市區曾存(現廢)之寺廟表

寺廟名稱	祀奉主神	推定位置	資料來源*	備考
1.烽火館	關聖帝君	長安里	碑記二, 尙存	民族路邊澄源堂前
2.海壇館	五福大帝 天上聖母	啓明里	2:139; 銅山館碑	今省立醫院西南
3.南澳館	不詳	長安里	2:138,139; 銅山館碑	該館後東遷復興里
4.閩安館	不詳	不詳	2:139	
5.媽祖館	天上聖母	長安里	銅山館碑	現與銅山館合併
6.武忠廟	不詳	復興里	1:8; 2:58-59	今海靈殿附近
7.地藏王廟	地藏菩薩	復興里	1:8; 2:66; 海靈殿碑	菩薩今祀於海靈殿內
8.風神廟	風神爺	重慶里	1:7; 2:58	原址可能在今鎮公所附近 風神爺今祀於天后宮
9.龍王廟	龍王	中興里	1:7; 2:58	原址在今觀音亭東畔 龍王今祀於觀音亭內
10.昭忠祠	清陣代官 亡官兵	啓明里	2:61	確址不詳可能在省立醫院至漁港之間某處
11.程朱祠	程灝、朱熹	重慶里	2:57	今有志旅社附近

*註：本欄資料來源中(1)代表蔣鏞之澎湖續篇，(2)代表林豪之澎湖廳志，其後之數字代表頁數，故1:7即是資料摘自澎湖續篇第七頁之意，餘類推。

以上二表所列馬公市區現有(二十二處)和曾有而現已不存(十一處)之寺廟合計卅三處，即爲下文所要討論的焦點；當然已毀的寺廟故老相傳的口碑中仍有幾處，例如財神廟，其神像現祀於福德祠，但其始建，修建之年代及倡議題緣捐獻者均已無案可稽，在本文中沒有討論的價值，故未列出。

本文所列之寺廟，除閩安館、昭忠祠及祀壇原建之確址不詳之外，均已標明在前揭地圖之上，由於市區的發展改變，有些推斷之廟址可能不十分精確，但筆者已盡力查證，希望錯誤能減到最小的程度。

三、馬公寺廟簡略沿革

上節所列之各寺廟，一般都缺乏詳明可信的寺廟沿革歷史記載，有關其創建，整修之年代只能從舊志及各種碑記中細心尋覓，才可得到若干蛛絲馬跡；以下即依序簡述各廟創建、遷建、整修之年代及其支持者，以及概略現況。

天后宮為台灣現存之最古廟宇，創建年代當在明代中葉以前，清代之後乾隆四年（西元 1739）澎湖通判及澎湖協鎮，遊擊合買店屋一座，以其租金充香火之資；十五年通判及協鎮改造後殿；五十七年協鎮疊其屬下之左右營遊擊、守備倡捐重修；嘉慶廿三年（1818）通判、協鎮、護協與左右營遊擊，守備倡捐勸修。民國十二年陳柱卿等地方仕紳倡修〔以上參見胡建偉 1771:40；蔣鏞 1832:4-5；林豪 1893:58；莊東 1978:19-20〕。又根據廟中碑記所載，道光廿五年（1845）海壇監生劉元成買瓦店一座以助香油之資。

無祀祠現稱祀壇，建於康熙廿三年（1684），由胡氏紀略所稱：「廟中周歲燈油，俱係協營捐辦」的說法看來，可能為清代成兵所建。乾隆十五年通判、協鎮等公捐增修廓大；廿九年澎右營遊擊等又公捐重修；四十六年澎協鎮率營弁倡捐重修；嘉慶廿五年右營遊擊募同（鹽）課館連金源、郊鋪金長順等捐修；光緒三年管駕輪船至澎巡防之記名總兵吳世忠捐三百金重建〔以上參見胡：42-43；蔣：8；林：63〕〔註二〕。民國二年其廟址被日海軍佔用，由媽宮區長陳柱卿在民國五年遷至馬公鎮草樹仔尾公墓道旁，公車修車廠北方現址，前被一石匠作坊遮蔽，從道上無法見到該廟，現僅該石匠按時燒香祭拜及維護，平常甚少人去祭拜。

北極殿據民間傳說係明末所建，但台灣縣志稱係康熙廿九年（1690）澎協左營守備趙廣所建，五十六年左營遊擊陳國璫重修〔陳文達 1720:216〕。其後有記錄的整修年代是乾隆五十六年通判會同協鎮及左右營遊擊，中軍左右營守備勸捐重修；嘉慶廿三年通判、澎協、護協及左右營遊擊、守備等倡捐勸修；光緒元年董事高其華等修建〔參見蔣：5；林：66-67〕。民國卅八、五十四、六十五年曾分別

重修或增建。現爲馬公東甲之角頭廟，民衆俗稱其爲東甲宮。

觀音亭康熙卅五年（1696）遊擊薛奎所建；乾隆廿九年曾修一次，何人捐修則諸志均未說明；四十六年通判及協鎮、護協、烽火參將，左右營遊擊、守備等勸捐撤基重修；嘉慶十年澎協及左右營遊擊、守備等捐修；光緒元年例貢生黃學周等鳩資重建；十七年總兵捐銀五百元，整建中法之役間被法軍毀掠之處，剩銀百餘置店屋收租以資香火。民國十六年及四十八年各方集資再修建〔參見胡：40-41；蔣：5；林：66；莊：20〕。據廟前一廢棄之碑所載，道光末年海壇監生劉元成買瓦店一座助其香油之資〔註三〕。

水仙宮亦爲康熙卅五年薛奎所建〔陳文達1720:216〕；乾隆四十五年協鎮捐廉率同海澄監生郭志達等勸捐重修；道光元年通判、協鎮、護協及左右營遊擊、守備倡捐改造；光緒元年媽宮街商民鳩資修建〔蔣：6-7；林：65〕。約在民國四十七年左右又曾修建一次。現在已甚破敗，香火極少。

武聖殿又稱關帝廟，康熙卅六年（1697）澎協尙宣建〔註四〕〔陳文達1720:216〕；康熙五十六年澎協許雲擴建〔蔡平立1979:543〕；其後乾隆卅一年通判與左右營遊擊等倡捐整修；嘉慶七年通判會同澎協、左右營遊擊、把總等勸捐重修；廿一年通判會同協鎮、護協與左右營遊擊、守備、千總等勸捐修葺；道光五年通判偕協鎮、左右營遊擊、守備等勸捐重修；光緒元年協鎮吳奇勳遷建至紅木埕現址；十七年總兵吳宏洛捐五百金重修；民國廿六年郭廷光等勸捐重新拆造〔胡：38；蔣：4；林：57；莊：23-24〕；六十二年又重新整修成今貌。武聖殿原建於澎湖清軍校場邊，爲武營所崇奉之祀典正神，現在由紅木埕居民釀資改建得金壁輝煌，已變成其角頭廟了。

施公祠大約建於康熙卅五年施琅卒後，道光初年通判蔣鏞將在澎奉差因公遭風歿於王事者之木主亦附祭於此〔蔣：8〕。此祠似乎不受重視，故其有關之文獻資料甚缺乏，惟其與海壇戍兵似有特殊關係，清代唯一可考的一次整修是道光廿三年海壇右營戍澎兵丁428名共捐餉銀128兩餘，及其董事海壇監生劉元成捐廿兩合力

重修（碑記尚存）。海壇戍兵之海壇館被日人拆毀後，其神像及其中之神主牌位即移祀於此；且其現任管理人（住於本祠之左右兩廂）之祖先是海壇人。民國五十九年現任管理人項先生曾做一次整修。施公祠除管理人上香外，平常香火亦不盛，據故老稱施公祠原址約在今省立醫院附近，日據時始西移至今址。

三官殿古名嘉蔭亭，俗稱五里亭，乾隆四年（1739）通判胡格建，原為舊廳治文澳與媽宮間供行人歇腳之亭，其內供奉天地水三官等神明；廿九年里人重修；嘉慶元年及廿四年兩任通判分別捐俸重修；道光三年通判蔣鏞於廟外建亭及築照牆；廿五年通判鄧元資重修，生員林炳垣等董理，民國廿六年拆除前亭，擴建成今貌改稱「三官殿」〔胡：41；蔣：6；林：65-66；莊：24〕；五十六年附近火藥庫爆炸，受爆風波及，曾重修一次。

提標、銅山、海壇、烽火、南澳及閩安六館都是清代戍澎湖兵所建，做為其各營戍兵調差換防，出差公幹時住宿搭伙之落腳點，一般都建或三合院式，中廳祀神，兩廂棲兵卒〔余光弘等1980〕。這六個館之確切創建年代已不可考，但從現存的烽火館修建碑記可以推斷其始建之約略年代。烽火館現存石碑之一是乾隆卅年澎湖江起蛟率其手下所有營官捐助重修烽火館之碑；另一為光緒十六年之碑，開頭即稱：「斯館者烽火營戍兵業也，稽其始建自乾隆年間，…」，故可推斷烽火館最遲建於乾隆初年。再比較當時福建水師提標各營派撥澎湖之戍兵，以烽火門營之92名為最少〔上引文：31〕，其餘各標營均在二百名以上，人數最少的烽火營兵在乾隆初以前可以建館，其他各標營之屬館當不會後於此期限，台南安平亦存有一烽火館重建碑記，勒碑年代是乾隆卅三年〔黃典權1966：79-81〕，我們可以大致推測，康熙廿三年清政府始行班兵戍台之制後，五、六十年內各標營大概都已建立其會館，故至乾隆卅年左右，兩個烽火館就達到該整修的地步（澎湖通史亦載銅山館在乾隆卅三年及光緒三年分別由澎湖許德及吳奇勳增建、重修，可惜未註明資料根據，參見蔡平立1979：542）。

這幾個館現在僅存提標館及銅山館，但二館的香火都不旺，完全依靠其原始信

徒之後裔在維持，二館現在仍保有許多廟產，包括土地及店業，其租金收入是二館的主要經濟來源。其餘各館在日據後陸續被拆毀；閩安館可能是最早被日人拆除的，故馬公故老無人能言之。海壇館日據初建立現在之省立醫院時地被徵用館舍被毀，其神現合祀於施公祠。南澳館曾被日人佔充宿舍，光復後始被拆去前段，現仍存部份朽壞館舍。烽火館廿餘年前因拓寬民族路被拆。銅山館原址被日人佔充郵局，繼改爲街役場，其神移祀於媽祖館，後二館合而爲一，在民國四十年重修改稱銅山武聖殿；六十九年曾拍賣部份產業加以整修。提標館原在今北極殿前，館址被日人徵用建立現在之省立醫院，民國十八年改建在現址，廿餘年前曾重修一次。

致於與銅山館合併之媽祖館，亦係銅山人所建，可能是平民所建之會館，而非如上述諸館是戍兵之伙館，但其真正緣起已不可考，有待更廣泛的調查求證。

武忠廟及地藏王廟之創建年代及建立者均不詳，在蔣、林二氏之著作中，後者照抄前者，故只知武忠廟在乾隆五十六年曾由澎協同左右營遊擊、守備、及董事高必成倡捐重修，因此推測在乾隆中葉前即已存在。地藏王廟只簡單的記其位置「在武忠廟間壁」而已〔蔣：8；林：58-59, 66〕；不過從海靈殿的碑記上又可得知「曩時該廟有前後兩落，前係宮殿式，祀地藏王菩薩，後乃民居式，爲外籍來澎任官在本地物化者停柩候船運歸之處，……（道光十七年蘇王爺金身從祀於地藏王廟，同治三年海靈殿建廟）未幾地藏王廟因年久失修將傾圮，佛像移祀於本殿，不復重建……。」（海靈殿落成碑記，括弧內係筆者所加註）。澎湖廳志成於台澎割讓之二年前（光緒十九年），志中載有武忠廟及地藏王廟，可見斯時二廟仍存，可能均毀於日據初期。

城隍廟建於乾隆四十四年（1779）。城隍之祀由來久矣，有清一代在台設官分治，若其行政單位在縣級以上，則必建有城隍廟，凡守土官入境，必先祭城隍而後履任。澎湖原來之巡檢及以後改設之通判衙門設於文澳，第一座城隍廟亦設於此。乾隆卅六年胡氏紀略所指之城隍廟即是〔胡：38〕。但因媽宮係碼頭渡口所在，爲對外交通之樞紐，亦是衝要之區，各武職衙門均設於此，所以乾隆四十四年通判

謝維祺率董事監生郭志達另建一座城隍廟於媽宮；五十五年通判捐俸率商民修理，並添建後殿五間；嘉慶三年通判勸商民重修；廿二年通判以罰項番銀生息銀元召匠修葺；道光四年通判籌款重修；廿四年左營遊擊蘇斐然及監生張騰廣重新修建；光緒十一年中央法戰後，通判飭紳士黃濟時、蔡玉成、徐癸山等捐貲重修。民國廿二年地方士紳倡修成現貌〔蔣：4；林：56-57；莊：22-23〕。

以上天后宮、觀音亭及城隍廟號稱三大古廟，係闔澎所共同敬奉之三大廟，現在由馬公三甲輪流管理各廟，各甲角頭廟之管理委員會，每年輪流兼管三大廟之一。

風神廟乾隆五十五年（1790）通判會同協鎮及左右營遊擊捐建；嘉慶四年通判添買民房一間拆建；道光五年通判撥小舢舨一百號納餉充其春秋二祭之費；光緒七年都司郁文勝倡捐重建，監生葉國樑董其事〔蔣：7；林：58〕。其廟已毀，風神爺本來改祀於其鄰近之城隍廟內，後來移祀於天后宮至今。

福德祠為馬公市區內唯一的土地廟，平時接受四方信徒之禮拜，雖廟舍甚狹小，但香火極旺。廟中土地公原奉於城隍廟中，後來城隍廟中神像增加，無處容身，乃另建一廟於現址，據廟中沿革志稱係建於乾隆五十六年，可是這個資料是扶乩所得，故仍有待求證。民國九年財神廟被拆，其神即迎入廟中與土地共祀；卅六年、六十九年曾加重修。另有一土地廟景福祠位於中央里正義街一民房之二樓，該民房即廟產，供給廟祝免費居住，廟祝負責其香油。本祠原係一低矮小屋，從其位置上看，筆者疑其可能為原建於左營遊擊署內之土地祠〔胡：117〕；民國卅七年改建成二樓建築，一樓由廟祝居住，二樓祀神；本祠位置偏僻，且常重門深鎖，除其附近少數居民外，馬公居民很少有人進去參拜。

龍王廟道光六年（1826）通判會同協鎮、左右營遊擊倡捐，擇觀音亭東邊舊廂房拆建，並詳請以查出小舢舨一百號徵餉充春秋二祭〔蔣：7；林：58〕。其廟可能亦毀於日據時，現龍神奉祀於觀音亭右廂內。

陰陽堂原稱有應公廟道光年間建於文澳澎湖廳署之右側，原為歷任有司及其部屬之官吏，在職中亡故而無後者則祀之，後民間失祀之男女幽魂亦集於斯，光緒十

五年澎廳移至媽宮城內，陰陽堂亦隨之遷移至廳署之側的現址，民國五十八年改建成今貌，其正龕所祀軟身七爺神像（謝將軍）係日據初從海中拾起者，光復後再塑陰陽公與之合祀，乃改稱陰陽堂，現香火極旺。

海靈殿可能前身係神明會發展而成，據其碑記稱道光十七年（1837）即已雕塑蘇王爺金身奉於地藏王廟，同治三年方才建廟。民國八年曾重修一次，民國六十年擴建成今貌，（以上據海靈殿重建落成碑記）。此廟民間俗稱南甲宮，為馬公南甲之角頭廟。

一新社原係地方文人士紳在咸豐三年（1853）組成之神明會，奉祀關聖帝及許真君牌位，和木筆沙盤，請神降乩，以神道設教普遍勸人為善。光緒十七年雕二神金身，借媽宮育嬰堂（在今北辰宮西）設壇供奉，廿一年甲午戰役遭兵燹之亂後，社壇遷至澄源堂中（較上址略西北偏之處）；民國元年方建廟在今天主教惠民醫院附近；民國四十一年因都市計劃原廟被拆去，五十三年原神明會之後裔再度聚合成立神明會，申請立案核准，五十四年在現址建廟，至五十八年落成。該廟據說是全臺灣業開基之廟，現在協助其他地區之廟宇成立鸞堂，並且有定時之扶乩降神會，民衆有疾患常至此祈禱求治。

昭忠祠光緒四年（1878）澎協吳奇勳等創建，官兵義勇立一牌，內祀同治元年協營各標戍兵調赴台灣剿辦戴潮春之役殉難諸將弁，以及戰艦失事死難之官兵義勇等，其位置僅稱在「媽宮澳東南」〔林：61〕，詳細地點難以確認，可能亦毀於日據初期。

程朱祠光緒十一年（1885）通判程邦基建，紳士蔡玉成、黃濟時、徐癸山監工（店業五間充香火）；十九年冬訓導蔡玉成、黃濟時，裏生薛元英、生員徐癸山等籌捐經費於祠左隙地創建文昌閣，祠右隙地建立講幄，增建耳房，以書院（在文澳）距城稍遠，故於此地建學舍，為師生講學課文之所〔林：57〕。其址約在今中興路有志旅社附近，日據初曾充媽宮公學校教室，為校舍之一部份〔莊：21〕，現亦已片瓦無存。

朝陽祠主神洪先生公來歷有各種傳說〔註五〕，其建立年代約在光緒廿年左右，不會更早於光緒十五年；日據時拆毀城牆修造馬路時，拆掉朝陽門，其祠亦被波及，乃遷至現址民權路一商店之二樓。其信徒為早先居於朝陽門周圍之居民，每年七月廿七日按時舉行普渡儀式。

北辰宮重修碑記載「朱府尊王係前清鄉紳黃濟時組成，廿二家輪流盟祀，神蹟赫奕者四十餘年，至光緒廿五年（1899）己亥始興建廟宇…。」依此推算則此一奉祠朱王爺的神明會當成立於咸豐初或道光末，至光緒廿五年方由北甲地方之信徒合力建廟。光復後民國卅六年曾重修，卅八年又增建四垂亭（以上據廟碑）。北辰宮又稱北甲宮，是市區中和東甲北極殿，南甲海靈殿齊名之角頭廟，現正撤基重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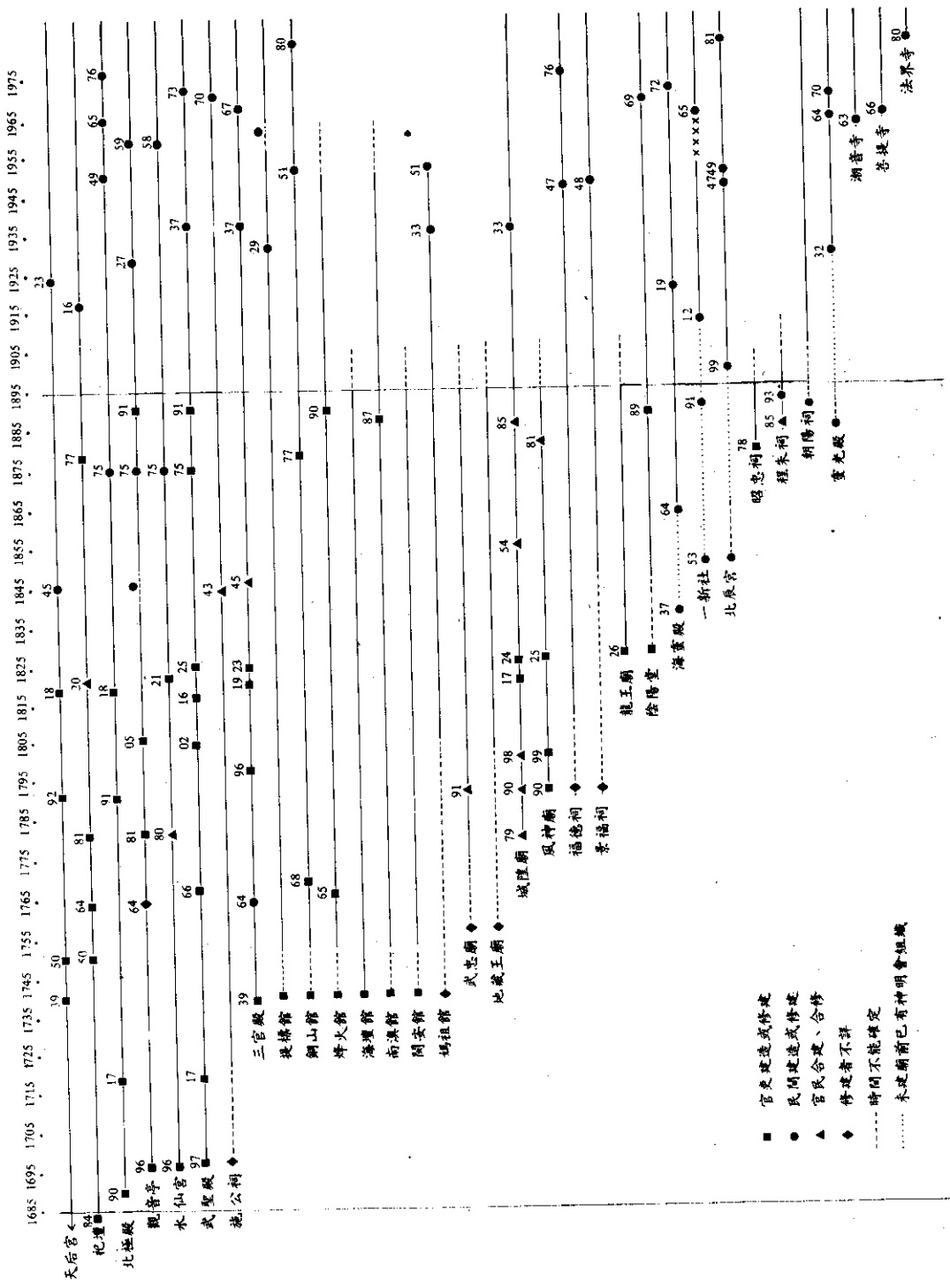
靈光殿所祀朱王爺原稱「諸靈公」，係水流屍無主孤魂，往昔「社中亦有塑金身而作盟兄弟會，年年過家越宅，個個祀奉虔誠」，至民國廿一年降乩指示始明諸靈公係清時三舉子返鄉祭祖時遭風遇難，屍體飄至火燒坪社海邊，由里人瘞埋敬奉，後二人陞他處為神，獨留朱姓者受玉帝勅封為王爺；知其原委後，火燒坪社人乃集資建廟奉之（以上據靈光殿碑記）。可知靈光殿之前身與海靈殿，北辰宮，一新社一樣，都是一個神明會組織，後來才聚資建廟奉其原祀之神像金身。此廟俗稱火燒坪宮，係火燒坪上下社之角頭廟，民國五十三及五十九年續有整修，擴建。

潮音寺、菩提寺及法界寺為近廿年來在馬公陸續成立之三座佛教叢林，建立年代分別是民國五十二、五十九及六十九年，三寺均有僧尼常駐。

四、清代馬公的市鎮與寺廟

前節所述馬公各寺廟沿革梗概，可以簡化做成圖一，俾在討論時對整體的狀況能看出一個較清晰的輪廓。

從圖一中我們可以看出，在日據以前馬公寺廟的建造，修護，主要是依靠當時在澎湖任職的文武官員，在七十一次可以確定支持者的寺廟建造或整修行動中，官



圖一 馬公寺廟創建、修建簡略示意圖

- 官吏建造或修建
- 民間建造或修建
- ▲ 官民合建、合修
- ◆ 修建者不詳
- 時間不能確定
- 未建廟前已有神明會組織

民合力的只有十四次，純由平民出資的更少到六次而已；其中的72%（五十一）均由官吏負擔。有一個可能性是做方志的官吏或文人僅記有官銜者，而不載平民百姓，但從台灣其他地方志來看這個推論並不能成立，例如台灣縣志所載之台南東安、西定、寧南、鎮北四坊的寺廟，其中除官吏建修之記錄外，尚有許多「僧募衆重建」，「里人（重）建」，「里人同（修）建」，「鄉人同建」、「居民重修」等記載（陳文達 1720：207-211）。類似的記載在前述胡、蔣、林三志中也不乏其例。

在日據之前存在的二十座寺廟中，從其性質可以分出官方神教〔official religion 參見 Feuchtwang 1977〕寺廟七座（天后宮、祀壇、武聖殿、城隍廟、風神廟、龍王廟、昭忠祠），都是由官府出公帑每年例祭二或三次的；班兵祀神伙館〔參見余光弘等 1980〕六座（提標、銅山、海壇、南澳、烽火、閩安六館）；水師及航海者參拜之神廟三座（水仙宮、觀音亭、媽祖館）；另外祀奉在職亡故而無祀者亦有三處（施公祠、地藏王廟、陰陽堂）；還有追求科舉功名者所敬奉的程朱祠一座〔註六〕；總共二十座，佔76.92%。可見在清代馬公的寺廟政治功能遠較宗教功能為重，也不像台北萬華、大稻埕、大龍峒的寺廟是因民衆同籍〔註七〕（compatriot）、同業（commercial）或同住一區（territorial）組合起來，以建立廟宇〔Feuchtwang 1974〕；這些寺廟組合的特性在清代中葉以後才逐漸在馬公出現。

在圖一的下半部，我們可以看出在道光中葉以後，出現了四個由神明會演變成的寺廟（海靈殿、一新社、北辰宮、靈光殿），這四個廟中一新社是以扶乩降鸞勸世的，其他三個主祀神都是王爺。另外還有一個朝陽祠其性質亦頗類瘟神，其主神洪先生公係一橫死者，而常在其住處四周顯靈，乃得到居民之崇祀。從這幾個廟的主神看來其民間信仰而非官方神教的性質已十分明顯。

這些末期民間所建的廟宇，再加上早期若干廟宇性質的轉化，產生了幾個馬公市區內屬於各社區的角頭廟。馬公除了前述三大古廟屬「闔澎」所有（廟中有作醮、迎神賽會，廟宇重修等可以向全澎各地信徒募捐）之外，其他都是“私的”，即與鹿港的「闔港的」和「角頭的」之分別相同〔Deglopper 1974:50〕。這些角頭

廟最有名的是三甲所屬的東甲北極殿，南甲海靈殿，北甲北辰宮；另外武聖殿原來也屬「閩澎的」，但在光緒元年遷至紅木埕，現在由紅木埕的居民獨力管理、翻造，已變成「私的」角頭廟，有人亦稱其為「紅木埕宮」。其次的是火燒坪社區所有的靈光殿，一般也稱做「火燒坪宮」。朝陽祠信徒居住的範圍在重慶里北端，光復、中興二里南端；景福祠信徒僅有天后宮及水仙宮之間的少數人；亦可算是較小的角頭廟。

從馬公寺廟逐漸平民化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出馬公自清以後，市鎮功能的逐漸轉化，以及民間人力財力日益增長。

清廷消滅台灣鄭氏的抗清力量後，曾有棄守的考慮，後賴施琅之力爭方才保留，所以當時清政府對台灣及澎湖一開始就是消極的態度。但澎湖的軍事戰略地位清廷倒有一極深刻的印象，胡建偉曾說：「澎湖屹峙巨浸之中，幅員不過百里；而島嶼森列，巨細相間，砂線迴環，坡隴相望，古稱長江天塹不足以喻其險也。昔鄭成功窺之而喘延三世，朱一貴失之而六日可平…」〔1771:14〕。鄭成功進取台灣之前先攻下澎湖；施琅平台時主要的決戰場即在澎湖海，澎湖一陷鄭氏即不戰而降；至朱一貴之役因澎湖未失，可以為清廷平臺部隊集結轉運之兵站，乃得迅速擊潰朱部收復台灣。所以康熙六十年朱役亂平後有人竟提議台灣總兵移鎮澎湖，而在台灣設副將；可見澎湖的軍略地位之被看重。故清代駐兵之數台灣設一鎮兵數僅一萬，澎湖設一協，軍力二千。

但因「媽宮汛乃澎營居中最要之地也，為本(協)標營署駐紮之所，密邇文澳澎湖廳署；倉庫、錢糧與夫兩營軍裝火藥局，皆在於此。且舖舍民居星羅雲集，又為台厦商艘出入口岸，在在均關緊要，稽查防守責任甚重。左營例派戰守兵二百五十名，戰船八隻駐防，右營例派戰守兵三百三十二名，戰船九隻駐防…」再加上駐紮汛口炮台之兵計一百五十六名〔胡建偉 1771:126-128〕，馬公當時實是清朝之軍事要地，除要塞炮台外，還有協鎮署，左、右營遊擊署，左、右營守備署，軍裝局，火藥局，及一所大教場〔上引書：117-118〕，另外還有各標所建祀神之伙館，亦佔

相當廣大之區域，約為現在省立澎湖醫院至真善美戲院附近，都是戍兵霸佔的產業。

從人口上來看乾隆卅二年的媽宮澳僅有男女一千四百四十人，可是上面所列的兵數已達七百三十八人，再加上各級營官弁目、各營署親兵等總數當超過八百人。故我們可以看出清朝時期馬公市區內主要是綠營兵的天下。這些派駐台澎的班兵往往是其原屬營中不守營規軍紀者，重修台灣府志中即稱：「各營將弁往往不肯將勤慎誠實，營武中得力之人派往（台澎）」〔范咸 1747:302〕，因此「班兵軍紀敗壞已極，多借住民家，包娼聚賭，挾械以嬉；甚至各分氣類，私設公廳，犄角爭鬥」〔李汝和 1970:19〕。澎湖廳志有載：「澎地本狹隘，媽宮澳尤甚，而各標戍兵橫暴習慣，甚或佔地十餘里外，如隔水之小案山，亦指為該標之管業，有明買扞葬者，則群起阻之，遂使民有死無葬地之謠」〔林豪 1893:315〕。戍兵勢力的囂張對清代馬公的發展有頗大的限制。

所以早期的馬公寺廟，除各種由官方所支持的之外，最為興盛的是各標戍兵所建的祀神伙館，林豪稱「其制度宏敞奢麗」〔1893:139〕；現在各館雖然均已不存，不可得悉其盛狀，但從署澎鎮右協都閩府李札中看出烽火館「帶有兩廊護厝，間數甚多」〔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72:211〕，既言間數甚多，又要命人查明其「大小、一切間隔若干」（同上註），可見其館之大了。烽火營兵係當時派駐澎湖諸營人數最少的，其他人多勢衆之營的廟館當更為壯觀。

這些廟館除了本身館舍豪奢之外，尚佔有大片的產業（其位置在中央里、復興里最古老社區的東側，也就是渡口附近的精華地段），例如提標館和銅山館雖經多年的變賣及政府徵收，其所餘之廟產每期所納的地價稅仍在數萬之譜，可以確定為其所有，而現被佔住或出租的店業房產也還有數間。這些廟產的存在是今日二館得以繼續苟存的重要因素。

清道光之後，澎湖所佔的優越地理位置，使其在台厦之間貿易所具的重要性日愈提高；馬公的港口又是一個天然良港，於是馬公除軍港之外，商港的性質漸增。以前「臺厦往來船隻，透洋直過者居多」〔胡建偉 1771:58〕。自此以後漸有「媽

宮郊戶自置商船，或與台廈人連財合置者，往來必寄泊數日，起載添載而後行。若非澎郊之船，則揚帆經過，謂之透洋，惟遇風潮不順偶泊外嶼耳」〔林豪 1893: 307〕。

從圖一中可以看出道光（1821）年之後，建、修廟宇共計二十九次，其中有八次是官民合力，五次是純由民間出資，與道光以前比較（總數四十二，官民合力六次，民間獨力一次）顯然民間在寺廟的興修方面已有較大的財力可以支持。同時純由民間出資的第一座寺廟，也是馬公地方第一座祀奉王爺的寺廟（海靈殿），終於在同治初年出現。海靈殿的祭祀圈內（南甲）範圍的信徒，自古即以「好檣尾」〔註八〕著稱。南甲係清時渡口所在，其居民除郊商舖戶外，尚有許多駕小舢舨、杉板等接駁進港船隻的人貨營生的。因此海靈殿的創建具有重要的關鍵意義。

除了地區性角頭廟的出現之外，也有了與萬華龍山寺、新興宮性質相近的商業或同業組合所支持的寺廟。這就是臺廈郊與水仙宮的連結，與萬華不同的是水仙宮並非由臺廈郊所建，由其專屬的寺廟；水仙宮早在康熙三十五年即已建立，臺廈郊始於何時已無可考，但出現在文獻中是遲至光緒中葉的澎湖廳志〔上引書：306〕。臺廈郊與水仙宮的關係一直維持至民國四十年左右，以後往來臺廈的營生因大陸變色已不可行，老一輩的郊商去世後，臺廈郊就煙消雲散了，至今仍留存一「臺廈郊實業會館」之匾額掛於水仙宮外，失去郊商的支撐後，水仙宮現已十分衰敗破落。

馬公港市的商業狀況在清中葉之後雖然有若干發展，但在清領時期馬公的市鎮規模並不大，光緒十五年建竣的媽宮城包圍著當年的馬公市區，其周圍僅 789 丈〔上引書：54〕，僅約 2,840 公尺左右〔註九〕，筆者粗略估計其面積不足 50 公頃。從人口數字加以觀察也可以得到同樣結論；清朝文獻僅有澎湖紀略內有媽宮單獨的人口數字〔胡建偉 1771:220〕，當時（乾隆三十二年，1767）馬公人口計有 262 戶，1,440 人。到了明治三十一年（即光緒二十四年，1898）馬公人口計 623 戶，2,903 人，其中扣除日人則本島人有 524 戶，2,473 人〔臺灣總督府

1900:61)。一百三十年中戶數增加一倍，人口數僅增加 72 % 左右，每年平均增加不到 8 個人。當然日軍佔領澎湖時有許多人撤離馬公，返回大陸原籍；其次是日人竊據的當年霍亂流行，病死者甚多〔尹建中 1969: 肆~七〕，不過就算 1898 年之人口是日據以前的半數，日人登陸之前馬公的人口還是不到五千人。

這時限制馬公市鎮發展的不利條件，除前述戍兵在市內橫行霸佔房地產業之外，還有幾個重要原因：一、馬公未有港埠設備，船隻無法靠岸卸載人貨，必須靠小舟從中接泊，費時費事。二、腹地貧瘠，市場有限。澎湖土地不沃，加上雨量稀少，冬季季風強烈，農漁業發展均甚困難，故有清一代澎湖即以貧著稱，同時災荒頻仍（清代統治澎湖二百一十二年，澎湖有記錄的災荒共有六十五次，參見黃小平 1975:176）。常賴政府接濟，可以想見一般民衆之購買力必定不高。三、人口之大量外移，澎湖廳志曾載「澎民之赴台謀生者，年以千百計」〔林豪 1893:386〕，尹建中曾指出清代末期(1828-1892)澎湖由(人口)移入地變成移出地〔1969: 肆~七〕。

這些不利因素從日據時期開始至今，即逐漸減輕或解除。

五、日據之後迄今馬公市區的擴展與寺廟的關係

日據台澎之後，地方治安有了重大改善；同時在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台灣總督府指定馬公港為特別貿易港，專對我國大陸貿易輸出入，馬公港又檣桅林立，驟形繁榮。並且自民國二十六年十月起，費時二年半修築馬公港，建碼頭棧橋自岸壁伸入海中，三千噸之船隻可自由靠岸，小型輪船同時可容納六十餘隻。馬公港的短暫發展未幾即因中日戰爭及太平洋戰爭發生而受到影響，因澎湖係支援日本軍事南進之主要基地，馬公港與軍港毗連，為保軍事安全遂嚴格管制對外交通。台灣光復之後，開放馬公為省際港，恢復與我國大陸沿海各地貿易，民國三十七年剿匪局勢逆轉，再改馬公港為省內港，實際航運僅與高雄港關係最為密切〔張默予 1972: 6-7〕。馬公優異的地理位置本可成為台廈之間貿易的大站，卒因政治因素未能朝

此方向發展。

但馬公的軍事地位在日據時代及光復之後仍然受到重視，此後的軍人雖然不會再有建廟置產之事，他們的購買力對澎湖的民生有頗大的助益，尤其馬公為澎湖之首邑，飲食、娛樂等各業更由駐軍的巨大消費額而早蕩勃之勢，市鎮的發展亦得力頗多。

光復後對馬公市鎮的發展最有關係的是機動船隻的使用以及其他交通工具的改善。前者促使澎湖主要生計方式的漁業之收入提高，加上各種通訊器材、氣象預測技術之進步，使得漁民的海上生活危險程度相對降低，做為馬公消費市場腹地之鄉村地區的所得穩定而且提高，馬公市鎮雖然已經很少具有對外輸出的貿易功能，光是做為供應各鄉村的集鎮已能維持相當的繁榮了。各種新式交通工具的改善，以及聞名的跨海大橋的建立，吸引許多觀光客，造成澎湖觀光事業的勃興，近年來馬公的觀光飯店、海鮮店、特產行、旅遊業等十分興盛，觀光客為馬公帶來大量的財富。

以上簡述了光緒二十一年（1895）日據之後至目前馬公市鎮發展的概況，現在來看看寺廟與此段時期市鎮發展的關係。

日軍登陸之後，對馬公寺廟產生選擇性的壓力，許多寺廟從此之後逐漸步上消滅的絕路。最先受到影響的是清兵的六個伙館，閩安館由於乾隆末之後其兵額少至十名，至同治時僅剩四名，故乏人照料，是最早被毀的〔余光弘等1980〕。烽火館情況與閩安館相同，但因在光緒十六年時部司李培林已委由日兵林鳳捷管理，將館中兩廊護厝清理出租，以其收入做為香資〔台銀經濟研究室1972:211〕，故可以得知日人據澎之前烽火館已經成為一個平民住居的大雜院，所以才能逃過日軍當做戰利品接收挪用的命運。但由於其派下信徒已僅剩林鳳捷後人一家，因此二、三十年前烽火館因拓路被拆之後，至今已不存在，而且看情形似已無力再加振興。

另外四個伙館提標館與海壇館在日人建立現在的省立澎湖醫院之前館地被徵用，館舍被毀；南澳館曾被日人佔用做為其軍、公務人員之宿舍，現大部份被拆除了；銅山館先被佔充郵局，後又做為街役場（鎮公所）。南澳及海壇二標之兵據說在

甲午戰役後都已遷移返回故鄉〔註十〕，這二館大約也不可能再重建了。

提標館及銅山館一向缺少香火，除廟祝和管理人按時上香敬茶外，幾乎無人進館參拜。但由於其有大批廟產，同時派下後裔不乏馬公地方閩人，故仍能勉強維持，尤其二館之地產大都位於市區中心，近年市鎮發展結果地價上揚，二館廟產亦水漲船高，所以雖然馬公市民現在已不再以祖籍地做為一認同的參考標準，二館的事務却已漸受其原來派下信徒之後裔的注意。民國六十九年銅山館曾拍賣部份廟產，並向信徒募集部份款項，將該館整修一新。提標館信徒也在同年五月重新整理其信徒名冊，確定了七十個具有資格的信徒，據說也有信徒提議要重建提標館，以光大祖先基業。

其次與清朝政府及官吏有密切關係的幾個廟也趨末路。地方官春秋二祭祈求風調雨順的風神廟及龍王廟、祭祀清兵因公殉職或陣亡的昭忠祠（武忠廟或許性質相同，筆者疑其所祀為施琅平台時在澎湖海戰陣亡者）、官吏文人祭拜的程朱祠、以及做為停柩處所的地藏王廟。在清政府的勢力一撤離，即陸續消滅。有的神像寄祀於他廟，有的則連神像都不知所終。施公祠情況較好，其原係祀奉清廷平台名將施琅之祠，後來又附祀因公殉職之清兵木主，在海壇館拆毀後，二處神像合祀於此，其正廳祀神，兩廂為管理人所住，故雖香火不旺，却能與管理人相依為命，只要不像烽火館一般位在都市計劃的道路用地上而被拆除，大致上可以繼續存在。

清代建立的兩個有應公廟（祀壇及陰陽堂），性質相同，命運却迥異。本來有應公或大眾爺之類的無祀孤魂，台灣民間信仰中，認為其有求必應，故參拜燒香的信徒甚多。陰陽堂位在天后宮西南側，交通方便，過往行人川流不息，香火也一直很興旺。祀壇原建於觀音亭附近昔時的墓地邊上，民國五年土地被日軍徵用，遷往現在的公墓入口之道路西側，平常這條路除上墳的人及清道夫處理垃圾外甚少有人經過，加上其祠又被一石匠舖所蔽，過往路人並不能見到，現在的香火、燈油及維護只有仰賴石匠舖內的人家支持，在人口未擴張至此之前，其境遇大概不會改變。

馬公地區的發展大致可以說是先由海邊渡口開始，因此現在的中央里、復興里

是核心地帶，較次的地區是啓明里、長安里和重慶里，這就是當年媽宮城所包括的範圍。到清末人口又朝城外擴張，東甲一帶的人前往紅木埕（今朝陽里）開墾居住，另外火燒坪（今光明里）也開始有人居住，沿城往外即今光復里、中興里（昔稱埔仔尾）居民也日增。至日據末光復初除城內地區外，計有埔仔尾、紅木埕、火燒坪、澳仔底（爲火燒坪之下社今馬公國小西北側），及三官殿周圍的五里亭（今陽明里）等幾個衛星聚落環繞於馬公市區之北端。經過三十餘年的人口擴張之後，現在這幾個聚落已經連成一片。表 3 係光復之後至今歷年的各里人口數字，我們可以看出馬公市鎮擴展的軌跡。

從整體來看，政府遷台的民國三十八年，對馬公人口來論，由於大量的移民，使其人口在三年間突增大約 50%，由 8,104 人增至 12,178 人。因此在民國四十年，復興里分出一個新復里（當年人口 110 戶，356 人全都是外省籍軍眷居民）；光復里從北端分出光明里。到了民國五十年，緊接城內數里核心區的光復里因人口急速增加，又分出西半爲中興里。此後「城外」又因人口增加，另立數個新里。

另一趨勢是老聚落復興、中央二里人口在五十年時開始減少，因二里的發展已達飽和點，人口逐漸向郊區移動。五十五年及六十年啓明里和長安、新復二里人口也開始下降。六十五年左右原由光復里分出的光明里又在其北半分出爲光榮里。六十五年以後核心區以北的重慶、光復、中興及光明四里亦達到發展的限度人口也降低。至此只有最外圍的朝陽、光榮二里仍有發展之餘地，朝陽里在六十九年又分出其東南部份爲陽明里。從表 3 並參閱地圖可以看出馬公市區的發展是向北一波波的推進。

如果以昔時媽宮城的北面城牆（現在的民生路，參見第一節地圖）爲界，畫出一條線把馬公現在的市區分成南北兩部，做爲清朝以前及日據之後市區發展的分界，我們可以看出有清一代（1895 以前）所建之廟，除了三官殿之外均在此線以南的舊有市區範圍（光緒初年遷建武聖殿到線北的紅木埕；祀壇原址在觀音亭附近，民國五年方遷至現址）。日據之後至目前爲止所建的七座廟有五座在此線之北（即一新社、靈光殿、潮音寺、菩提寺、法界寺）。北辰宮和朝陽祠在界線之南，但却

表 3 馬公市區歷年人口統計表

里別	年代	35	38	39	40	45	50	55	60	65	69	70
長安	復興	1,292	1,623	1,727	1,772	1,832	1,986	2,158	2,523	2,283	1,897	1,859
	復新	985	1,598	1,529	1,250	1,214	1,266	1,188	1,076	936	778	756
中啓	復興	1,486	1,725	1,738	1,894	1,836	2,005	1,913	1,754	1,355	949	904
	明慶	1,034	1,540	1,551	1,699	2,314	2,596	2,905	2,885	1,395	997	875
重慶	復興	742	957	1,030	1,386	2,074	2,417	2,800	2,976	2,317	2,091	2,068
	復興	1,765	3,684	3,725	2,290	2,639	2,133	2,740	3,053	3,118	2,568	2,528
光榮	復興	800	1,051	1,072	2,008	1,524	2,225	2,060	2,354	2,637	2,009	1,930
	陽明				690	716	1,186	2,305	4,191	3,699	2,976	2,911
總計												
		8,104	12,178	12,372	12,059	14,476	17,776	21,742	27,483	27,476	26,874	26,784

資料來源：馬公戶政事務所戶籍統計報表。

分別座落於長安里及重慶里，係中央里、復興里腹心區北部的部份。

馬公的擴展，造成新成立的聚落社區，以及原有聚落社區的人口增加，這些聚落的成長茁壯必須有一可以做其社區象徵的具體表徵，在台灣民間此種聚落的象徵最常見的是社區角頭廟的發展。樹林及龜山岩村是建立許多土地公廟做為其各個社區的信仰中心〔王世慶 1972, 1974; 許木柱 1976〕。馬公的角頭廟主要是民間瘟神（或性質相近者）信仰的神明會蛻化而成之王爺廟（南甲海靈殿、北甲北辰宮、火燒坪靈光殿，以及近似的朝陽祠），前節已有述及。其次即是將位於社區範圍內的各類古廟轉化成社區的信仰中心（東甲北極殿、紅木埕武聖殿、還有景福祠）。這些角頭廟做為各聚落認同團結的象徵的意義，可由北辰宮今年拆除重建募款啓事中的一段話生動的勾勒出來：「邇來澎地各鄉鎮，甚至偏僻之村里，其廟宇莫不互相爭巧鬥麗煥然一新，唯獨本宮諸多掣肘，而抱殘守缺，拖延至今未能與他廟相媲美，實堪浩歎……。」角頭廟的情況代表的不僅是神明的靈顯與否，更重要的是與全社區的聲望地位攸關。

除了以一小聚落為其祭祀範圍的寺廟之外，前文尚述及祭祀圈包含全澎湖的閩澎三大古廟（天后宮，觀音亭、城隍廟），現在由城內三甲輪流管理。事實上具有此種資格的古廟原不止三座，北極殿及武聖殿原來也可算上一份，但因已變為社區專利的角頭廟，不再計入。水仙宮及三官殿也應屬閩澎廟；水仙宮和台廈郊發生關聯，在清末至民國四十年左右曾興旺萬分，因為其爐下弟子均是馬公最富有的郊商。台廈郊因老輩仙逝解體後，其所屬的公所也就沒落了。

三官殿現在仍由紅木埕社區負責管理，據故老相傳其原因如下：紅木埕原是東甲居民遷往開墾組成的聚落，因此當年東甲所擁有的祭祀圈範圍最廣，包括今啓明里以北的重慶里、光復里、中興里東半、陽明里及朝陽里；三官殿既然位在東甲界內，故當初三甲耆老士紳在商議四個閩澎廟字的管理問題時，決議由居民最多，範圍最大的東甲永久負責管理三官殿。東甲的祭祀圈太大，為了方便起見又分成三芸〔註十一〕，即海尾芸、中芸、和頂芸（或稱紅木埕芸），每年其主神生日繞境時由各

芸分抬神轎，以及推派人員管理東甲北極殿之廟務。東甲在分得三官殿之管理職務後，其三芸人士又集會討論，最後決議三官殿由紅木埕頂芸信徒就近管理，而免去其管理東甲本廟之義務。

紅木埕居民雖與三官殿有特殊淵源，但其距離該社區核心頗遠，故不能成爲理想的角頭廟；武聖殿却正在其中心地區，因此地方人士出資翻修擴建後，卒爲該聚落所佔有。

馬公在清時原爲台廈之間的衝要港市，大陸陷共之後，却變成爲台灣的邊緣地帶，故與台灣本島其他各市鎮的發展來比較，馬公和鹿港一樣，相對的是呈現沒落的局勢；但從其人口數字及市區範圍的絕對標準來看，馬公近數十年確有驚人的發展，其趨勢是由南而北的擴張，寺廟亦與此種步調一致，分佈地點逐步往北延伸。老市區中的古寺廟經過一番淘汰後，寺廟在整個市區的分佈，在空間上有均衡的傾向。

六、結 語

台灣鄉村和市鎮中的寺廟，雖然都是其居民敬拜神明的宗教信仰中心，但實際上由於兩種聚落在社會結構上的不同，其所有的寺廟在實質上也有相當的差異，不可任意混淆等量齊觀。

昔時鄉村地區的居民大抵在生計方式及其他各種社會文化背景趨向於同質化，一個村莊常是一個自足或至少半自足的單位，做爲其信仰中心的村廟，不僅只有宗教的功能，同時還是全村認同聚合的象徵，且具有政治、社會、文化、經濟、防衛等多方面非宗教的世俗功能。

反之市鎮（尤其港口市鎮）本身的機能十分複雜，常是某一較廣大地區的政治首府、貨物集散市場、交通中心、軍事要塞、金融財政中心、人文薈萃之地，因此市鎮中居民是異質的；這些異質的居民組成利益不同的社會群體，每個不同的群體常會建立其專屬之寺廟，以做爲會館及結合的標誌，因此在市鎮中有同業、同姓、

同籍、同一部隊，或甚至僅是同住一社區者所有的寺廟。故市鎮的寺廟不但在量上要較鄉村為多，在質上的差異也較大。

一個市鎮所具的機能絕非永遠不變的，一個商港可因港道淤積而減低其交通及貿易方面的功能；一個交通樞紐市鎮可能各種新式交通工具的使用而沒落；因此市鎮中居民的性質流動性也較高。可是寺廟却是固定的，其位置並不能隨其原有信徒之移動而做機動性的改變；隨著時間的流轉，有些寺廟屹立不搖，經常香火鼎盛，有些寺廟却經不起歲月的考驗，逐漸受到冷落，或甚至毀壞消滅，不復被人記憶。

不論這些廟是存是廢，從市鎮中各種寺廟的歷史做一研究，我們可以發現這個市鎮的發展就顯示在寺廟的興衰中。就像考古學家發掘一個遺址之後，可以看出該地各種族群活動的跡象一樣。一個古老市鎮中寺廟的歷史就是這個市鎮文化層的斷面。分析這些文化層我們可以得悉各種社會群體在這個市鎮中活動的證據，因此我們可以更進一步推知這個市鎮的機能，以及其發展和變遷。中國的宗教雖是社會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份，但却不是佔優越地位的部份，它經常淪為其他社會制度——特別是政治與經濟制度的附屬品〔許木柱 1976:91〕，故寺廟除了宗教的功能之外，必須時常調整、附加其他世俗功能，以配合整個社區的機能之運轉，否則無法跟上市鎮發展的步調，即會慘遭淘汰或沒落。

從馬公寺廟的研究，可以對上述論點提供實際的證據，以下將本文中討論的市鎮發展和寺廟的關聯，簡單歸納成以下數點：

一、澎湖地瘠民貧，災荒頻仍，有清一代視為其財政經濟上沉重的負累，但因其特殊之戰略位置，清廷又不敢輕言放棄，故清領時期在澎湖的建設十分有限，馬公係澎湖之首要大邑，從清代所建的廟宇可以看出大都具有其他的政治軍事意味，以輔助清政府遂行其統治為目的。

二、日據之後清朝政治勢力完全消除，原有的寺廟若不能轉化其性質，融入民間信仰體系中，即步上毀滅淘汰之下場。

三、清道光之後馬公港的貿易地位逐漸抬頭，不幸却遭到甲午戰爭，二次世界

大戰及剿匪之戰三次戰事的影響終難成事。水仙宮的興衰為這段奮鬥的歷程留下哀傷的記錄。但此種商業機能的興起，却促成民間財力的成長，而在清代中末葉之後，逐漸具有支持純屬民衆寺廟的能力。

四、市鎮的擴展提供寺廟新的發展空間，馬公市鎮的人口和聚落是由南往北，循序往北推移擴張的，寺廟也配合此種脈息逐漸北進，在時間及空間上均呈現出明顯的序列。這些寺廟在各個社區的均衡分佈提供各個聚落一個凝聚其社區意識的象徵標誌。在同籍、同業、同姓等各種認同標準逐漸泯除的現代台灣社會，寺廟與社區之間的連結趨勢，無疑的將提供民間信仰的各類寺廟繼續蓬勃發展的動力。

附 註

〔註一〕本圖原圖採自臺大土木工程學研究所都市計劃室於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所編之澎湖觀光發展主要計劃規劃報告，頁 55。

〔註二〕以下資料大都均引自胡建偉 1771；蔣鏞 1832；林豪 1893；莊東 1978；為省篇幅計各書均只標出作者之姓，其名及出書年代則省略。

〔註三〕原碑所刻時間部份已損壞不能辨認，惟林豪廳志（頁 251）中有傳述及劉元成「其初由海壇移居媽宮市，遂家焉。生平精於心計，以居積致富。後見同時刻薄成家者多出不肖子，轉瞬間傾覆殆盡矣，由是廢然意沮，自反其所為，出數千金為各廟香資…」云云。而天后宮（見前）有一碑記劉贈瓦店一座，其年代是道光二十五年，故筆者推定其贈瓦店予觀音亭之時間亦當在道光末年。

〔註四〕尙宣任澎協副將係在康熙四十三～五年，康熙三十六年澎協何人諸志書均闕漏，有一可能是尙在三十六年任澎協副將，四十三年又回任，此種事例甚多，如江起蛟、蕭得華、陳成化、吳奇勳、蘇吉良等人均曾回任二度任澎協副將（參見陳漢光 1968:189-193）。

〔註五〕筆者訪得一說洪先生公係築媽宮城時被壓斃於朝陽門附近之兵弁；另一說指其係日人登陸時被殺之一文士，他居於朝陽門附近，平時亦能診病療疾，死後地方人士有疾禱之輒應，乃建祠於朝陽門附近奉之。

〔註六〕當然這些寺廟有些兼具數種性質，若天后宮亦是航海神之廟，昭忠祠主祀清軍因公事或戰陣死亡者，也可和陰陽堂併列。

〔註七〕提標、海壇等六館係同籍之清朝綠營兵丁所合建及維護，但其實際性質很類似現在的「國軍英雄館」，與台北萬華的清水祖師廟（安溪人建）和龍山寺（三邑人建）等等同籍寺廟顯有極大不同。

〔註八〕馬公俗諺：「東甲好筆尾，南甲好櫓尾，北甲好龜裸」；東甲附近居民文風盛，南甲居民多郊商船戶漁民，北甲是餅餌店集中處，紅龜、發裸等等做得最好。

〔註九〕一丈折合約 3.60 公尺，參見 Chiang 1980: 120.

- [註十]南澳屬廣東，海壇屬福州語籠罩之地區，閩安亦屬之，烽火島在閩北沿岸，這四標之後裔可能因所使用方言不同，在戰後寧可返鄉，而不願留在閩南人爲主的馬公續住。
- [註十一]「芸」係閩南語音譯，其意和「地帶」，「條狀的區域」等意思相仿。東甲三芸劃分方式有多種說法，與本文無關，不贅。

參考書目

- 王世慶 1972 「民間信仰在不同祖籍移民的鄉村之歷史」，臺灣文獻，二十三卷，九期，頁1-38。
- 王必昌 1752 重修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13種。台北：台灣銀行。
- 尹建中 1969 「澎湖人移居臺灣本島的研究」，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研究所碩士論文。
- 余光弘、劉肖洵 1980 「澎湖馬公廟館的初步研究」，思與言雜誌，十八卷，三期，頁25-37。
- 李汝和 1970 「清代駐臺班兵防戍考」，臺灣文獻，二十一卷，三期，頁1~31。
- 1971 臺灣省通志，卷二，人民志、宗教篇。台北：台灣文獻委員會。
- 周于仁 1736 「澎湖志略」，見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澎湖台灣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104種，頁17-52。台北：台灣銀行。
- 林 豪 1893 澎湖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64種。台北：台灣銀行。
- 范 咸 1747 重修台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05種。台北：台灣銀行。
- 胡建偉 1771 澎湖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109種。台北：台灣銀行。
- 黃小平 1975 「清代澎湖經營之研究」，大陸雜誌，五十卷，第三期，頁10-31。
- 黃典權編 1966 台灣南部碑文集成；臺灣文獻叢刊第218種。台北：台灣銀行。
- 許木柱 1976 「岩村的村教活動」，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二期，頁73-94。
- 陳文達 1720 台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03種。台北：台灣銀行。
- 陳知青 1973 澎湖史略。澎湖：澎湖縣文獻委員會。
- 陳漢光 1968 「台澎水師職官表」，臺灣文獻，十九卷，第二期，頁159-212。
- 莊 東 1978 澎湖縣誌，卷十三，文化志。澎湖：澎湖縣文獻委員會。
- 張默予 1972 澎湖縣誌，卷七，交通志。澎湖：澎湖縣文獻委員會。
- 臺灣省政府民政廳編 1975 台灣省各縣市寺廟概況表。油印本。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72 台灣關係文獻集零；臺灣文獻叢刊第309種。台北：台灣銀行。
-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編 1900 台灣總督府第二統計表。台北：台灣總督府。
- 蔡平立 1979 澎湖通史。台北：衆文出版社。
- 蔣 鏞 1832 澎湖續篇；臺灣文獻叢刊第115種。台北：台灣銀行。
- Chiang, Tao-chang
1980 "Walled Cities and Towns in Taiwan", in Ronald G. Knapp ed., *China's Island Frontier: 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aiwan*. Honolulu, Hawaii: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Deglopper, Donald R.

- 1974 "Religion and Ritual in Lukang", in Arthur P. Wolf ed.,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euchtwang, Stephan

- 1974 "City Temples in Taipei Under Three Regimes", in Mark Elvin and G. William Skinner eds.,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77 "School-Temple and City God", in 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ang, Shih-ch'ing (王世慶)

- 1974 "Religious Organization in the History of a Chinese Town", in Arthur P. Wolf ed.,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